



无垣之“城”

——近代西安回民社区结构探微

[文章编号] J1001 - 5558(2010)02 - 0160 - 06

●任云英

[摘要] 历史以来西安回民社区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其宗教社会内部的组织秩序同构。回民社区在适应国家政令及地方法规制度管理的同时,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教坊为组织形式,教民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教坊制度下回民小集中的空间结构后面隐藏着的是居民的行为活动与教坊的物质空间秩序、社会生活组织秩序的高度统一,即物质形态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构成了西安回民坊巷居住和社会组织结构特征。

[关键词] 西安;回民聚居区;教坊;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 TU.098.1

[文献标识码] A

自唐以来,西安的回民以清真寺为中心聚集而居,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其发展可谓久远。西安明城区内回民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教坊,其聚集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晚清时期,西安明城区内回民主要聚居在西安城市西北隅,西大街以北,鼓楼以西,北至莲湖路、红埠街,西至大麦市、桥梓口。

有清一代,由于满清政府在处理回汉问题上的“扶汉抑回”政策,引起民族矛盾激化,“同治年间由“圣山砍竹”引发回民起义,这是回民对民族压迫的回应。而这一重大事件也威胁到西安城市内部回民社会的生存,但回民居住社会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无垣的“城”。回民聚居区曾俗称“回城”。^①从形式上看,回城并无城墙的界定,那么是什么使这一外来民族如此具有生命力,稳固地生长于斯土?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得不涉及回民社区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深层内涵。本文拟从清真寺与回民社区的关系入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S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7JJD770105),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后课题。

^① (民国)王曾善.长安回城巡礼记[A].(原载《月华》第5卷第1~14期,1933),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372.



手 探究西安回民社区微观结构特征。

一、回民社区中的清真寺与教坊制度

回民社区的形成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回民以信仰伊斯兰教义而被称为穆斯林,该宗教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宗教组织和宗教经济管理制度,促成了特殊的聚居模式,即教坊制度。所谓教坊,是由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全体教徒所形成的独立的、地域性的宗教组织单位。

教坊有其明显的特点。第一,教坊的独立性。凡有十几户、几十户或几百户穆斯林居民的地区,只要人们有能力,便可以建造一座清真寺,择聘一位阿訇任教长。凡在该寺举行宗教活动的教民,都属于寺的“高目”(阿拉伯语 Gawm 的音译,意为“居民”),归教长管辖,对本寺尽义务。这一区域便形成一个独立的教坊,与其他教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第二,教长的聘请制。各教坊的教长由本坊教民在品学兼优的阿訇中择聘而非世袭。教长任期一般为三年,可以连聘连任。^①

清真寺是回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中心,它的职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人们不仅在那里沐浴、礼拜,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还要在那里接受宗教教育,举办婚娶、丧礼、纪念故先贤集会,宰牲,排解纠纷,学文习武,甚至治疗疾病。因此,在回民社会,清真寺是具有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宗教组织。只要有人在某地建寺,就会有更多的人向这里聚集,往往形成回族人聚居的“小集中”的局面。

清真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不仅具有一定的居住社会组织功能和社区服务功能,同时还具有经济功能和教育功能等。

寺院的经济功能主要是通过教义中的“天课”形成一套经济运作关系,与回教中“五功”即“念、礼、斋、课、朝”结合起来。缴纳“天课”作为法定施舍,对于人们可以从精神上起到“净化”的作用,也可以散给贫困者、管理服务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和无依无靠者一定的财物。^②其实质是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均贫富,来实现社会内部的稳定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不仅清真寺自身能够在经济上得以维系,而且将教民缴纳的“天课”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使用于教区的公益事业,无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对于教民具有约束力和凝聚力。

西安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在明中叶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发端于陕西的经堂教育^③是清真寺教育功能制度化、系统化的重要标志,是穆斯林宗教组织为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以振兴伊斯兰教所形成的回民教育制度。明朝后期,由于语言汉化,一些穆斯林伊斯兰教信仰淡化并产生了弃教等现象,伊斯兰教的生存和传衍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所以,回族穆斯林有志之士,起而发展教育,积极开展宣传事业,以求复兴伊斯兰教,维护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地位。这就是经堂教育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明中叶至清末,以经堂教育为主导形式,辅之以家庭教育,回民以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为主的教育机制转化为穆斯林的学校教育,加强了回族的宗教教育及其居住社会的凝聚力。经堂教育对统一回族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巩固回族穆斯林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经堂教育使清真寺具有学校教育的功能,提高了教民的素质,并增强了清真寺作为教坊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中心的凝聚力,因此,清真寺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强化了回民聚居区的社会凝聚力量。

据记载,由于回民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对于教育的重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后,由沦陷区和黄泛区逃难到西安的穆斯林增多,阿訇王明德(河南籍)、马玉山(北京籍)倡议并筹集资金,民国

① 参见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教坊制度初探[A].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西北伊斯兰教研究[C].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5.143~154.

② 李键彪.西安回民与清真寺[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86.

③ 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220.

二十八年(1939年)在崇悌路西头(今西二路)建立伊斯兰小学,它是西二路小学的前身。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东新街清真寺,由回族人士举办了中阿小学,兼教中文和阿拉伯文,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入学者达八十多名。^①抗日战争胜利后,因物价上涨、经费无着而停办。

由于回民以清真寺为中心聚居,因此,清真寺的分布是回民社区分布的重要标志。至民国时期,西安清真寺计14座。除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外,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北、山东与河南等地来西安的移民中,回民建立清真寺,从而形成了新的回民聚居地。(参见表1)

表1 近代西安城内清真寺分布情况一览表

名称	别称	年代	寺址	教派	来源
化觉巷清真大寺	敕建清修寺或称东大寺	唐天宝元年	化觉巷街南	阁的木	马希文《西安清真大寺》。
南城清真寺	东大寺“麻稍儿”(附属)寺	清康熙二年(1682年)	回回巷西口内	阁的木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广济街清真小寺	东大寺“麻稍儿”(附属)寺	清乾隆年间	广济街中段路东	阁的木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大学习巷清真寺	西大寺	唐中宗乙巳年(705年)	大学习巷街之北端西侧	阁的木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大皮院清真寺		明永乐九年(1411年)	大皮院西南段	阁的木	“寺藏清咸丰立石”(《西安回族与清真寺》)
		明成祖永乐年(1403年~1424年)			《明清西安辞典》
小皮院清真北大寺	真教寺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	小皮院街南中部	阁的木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小学习巷清真寺	营里寺	元代,一说清乾隆甲午年(1744年)	小学西巷街南端西	阁的木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洒金桥清真古寺	敕建清教寺	明代中期	洒金桥街北段	阁的木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洒金桥清真西寺		清末	洒金桥街南端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八家巷清真寺		清末(从小皮院清真寺分离)	八家巷西口内	伊赫瓦尼	《明清西安辞典》
小学习巷清真中寺		民国十一年(1922年)	小学习巷极北端		马光启遗著《陕西回民概况》,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1993年。
东新街清真寺	西寺(有别于其东的建国巷清真寺)	1937年	东新街东端南侧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① 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纂办公室. 西安市教育志[Z].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356.



续表：

建国巷清真寺		1939年创建,1940年扩建	解放路建国巷内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北关清真寺	道北清真寺	1940年	铁道以北		李键彪《西安回族与清真寺》,三秦出版社2004年。

清真寺自身具有社区服务、教育、集会、医疗、沐浴等功能,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清真寺所特有的寺院经济管理,使寺院自身具有生存的能力。对教民的管理制度化,精神信仰的统一,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教民之间济弱扶危的向善理念是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基础。因此,教坊制度下回民小集中的空间结构后面隐藏着的是居民的行为与该教坊的物质空间秩序、社会生活组织秩序的高度统一,即物质形态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因此,回民聚居区以宗教为核心的精神和物质管理功能的双重并重,使该居民社会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凝聚力和信仰统一,这是回民聚居生活和共患难、同进退的主要原因。同治时期的回民起义使陕西的回民大量减少,然而居于省城西安的回民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清真寺的宗教管理是主要原因,因而清真寺所具有的宗教管理和社区组织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二、清真寺的分布与回民社区

西安的清真寺主要分布在府城的西北隅,即大小学习巷、鼓楼西北的花角巷(化觉巷)、北广济街、大皮院和小皮院地区。虽然回民教坊之间往往是平行关系,但西安的教坊之间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在教义、教规、宗教仪式以及管理组织等方面均以化觉巷清真寺(东大寺)为首,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冯从吾碑记称之为“清修寺”。由于其建筑规模大于西安的其他清真寺,故亦称“西安清真大寺”,又以位于西大寺(大学习巷寺)之东,也叫“东大寺”。该清真大寺所辖,为化觉巷、西羊市、北院门坊民。清光绪二十七年(1897年)《海洁泉德行碑》记载:“斯寺为省垣八寺之首,列户数百,居民千余。”^①旧时号称“八百家的大寺”。(据对东大寺马阿訇的访谈:“大寺有801家,是按门楼算,而许多门楼内不止一户。”^②)寺院组织有理事会,由12人组成,也叫12家“社头”,他们皆掌管寺务、财务、修缮和决定聘请任教阿訇等事宜。^③他们均属于“阁的木”派,即老派穆斯林。东大寺向居当地“七寺十二(三)坊”之首(七寺中不含伊赫瓦尼教派传入后分寺所形成的新寺),具有一套较完整的组织制度,为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中心。

居民聚居生活在清真寺周围,以清真寺为其宗教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称:“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西南及府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族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以西安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七座。”^④

回民起义前,西安府回民人口繁盛,《平定关陇纪略》载:“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⑤到同治初年,“省城节署浙后左右迤北一带,教门烟户数万家,几居城之半。教堂经楼,高矗云天,气势雄壮。绅富三之一,乐业安居,自成风俗。”回民以务农和经商为主;“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贸易经商,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⑥据民

① 马希明. 西安清真大寺[M].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24.

② 访谈材料. 化觉巷东大寺马阿訇(马希文之子)访谈,2005. 08. 21.

③ 马希明. 西安的几座清真寺[A].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47.

④ 勉维霖. 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Z].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154.

⑤ 丁万录. 陕西回族发展变迁的历史考察[J].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102~104.

⑥ (清)杨昌浚撰. 平定关陇纪略(卷一)[C]. 中国方略丛书第一辑.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⑦ 《回族简史》编写组编. 回族简史[Z].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

国时期的日野氏《野黎纪行》记载：“城之西北隅多为回坊居住之面积，人口约占全城五分之一，其居民悉商贾生活。”^①但在回民起义失败之后，西安回民人口凋零。据《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回民在城内十八年不准出城，直到光绪初年，官家传马、金、刘、穆、蓝、米六家出外为他们贩马，回民才算出了城。”^②可见当时回民中以贩马为业的不在少数，而且有一定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西安城内的清真寺共有九处，包括化觉巷清真寺、大学习巷清真寺、大皮院清真寺、小皮院清真寺、洒金桥清真寺（清康熙时建）、小学习巷清真寺（清乾隆甲午年修建）、广济街清真寺（清初建）、南城清真寺和八家巷清真寺。八家巷清真寺是清末伊赫瓦尼教派传入后，原小皮院清真寺中阁的木派教民一百五十余户分出，改建民房修成的。除清初为满足营中穆斯林的需要建了小学习巷清真寺和南城清真寺外，由于新旧教派之分，产生了八家巷清真寺，洒金桥清真寺在清末分为老寺和西寺，成为两坊。

民国时期，由于刘镇华围城，加之饥馑之灾，城内回民十室九空。“吾教贫苦之人每日所入不敷用度者，计居十之七八；丰仓足食者，仅居十之二三……省内有回教居民，大约不过一千户。城无巨商，乡无庄稼，中等营业除牛羊肉行为大宗外，其他商业则不过少数，而肩担贸易、日求升合者，实居多数。”^③

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城内清真寺已有10座，曰东大寺、西大寺、西古寺、西新寺、小学习巷寺、小学习巷中寺、大皮院寺、上寺巷寺、香米园寺、小寺。^④十寺中，以东、西二寺为最大，建筑亦最古。若加上东南隅原南城清真寺，则共11座。有关资料称，当时回民仅一千余户。据马光启《陕西回民概况》对回民的初步统计，其人口分布情况见表2所示：

表2 回民人口分布情况一览表

名称	年代	区位	回民人数(户)	城市区位	备注
大学习巷清真寺	唐中宗乙巳年	大学习巷街之北端	五十余户	西区	阁的木
小学习巷清真寺	清乾隆甲午年	小学习巷街南端西	七十余户		营里寺
小学习巷清真中寺	民国十一年	小学习巷极北端	四十余户		阁的木
洒金桥清真寺	清康熙年间	洒金桥街中部	六十余户		阁的木
洒金桥清真西寺		洒金桥街南端	一百五十余户		伊赫瓦尼
化觉巷清真大寺	唐天宝元年	化觉巷街南	三百户	东区	阁的木
广济街清真小寺		广济街南端	七十余户		阁的木
大皮院清真寺	明代	大皮院西南端	六十余户		阁的木
小皮院清真寺	明代	小皮院街南中部	六十余户		阁的木
八家巷清真寺		八家巷西口内	一百五十余户		伊赫瓦尼
南城清真寺	清代	回回巷西口内	十余户		阁的木
合计 11 寺			一千二百余户		

资料来源：马光启《陕西回民概况》，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1993年12月，第220~222页。

①（民国）刘安国编著. 陕西省交通志[M]. 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七年（1928年），31~37.

② 马长寿.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A]. 陕西文史资料[C]. 第26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73.

③ 马光启遗著. 陕西回民概况[A]. 马长寿.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C]. 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1993. 218.

④（民国）王曾善. 长安回城巡礼记[A].（原载《月华》第5卷第1~14期，1933）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1372.



三、清代以后西安回民社区的发展

西安市的回民社区在民国时期又有所发展。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华北首当其冲,迫使河北保定一带的同胞出逃,继而开封、郑州、洛阳、怀庆等地的同胞也接踵逃来西安,其中也有大批的回民。他们来西安后,即在新市区(今新城区)民乐园附近搭棚栖身,逐渐形成回民聚居点。热心宗教的白俊卿、白天章、赵国云等于1937年倡议募资,盖起了简易的礼拜棚,建立了“新市区清真寺”,即今清真西寺。后经历次修缮,形成正式规模。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新市区清真寺已满足不了骤增的回民人口进行宗教活动的需要,遂于1939年由白俊卿等倡议又在新城区建国巷增建了“建国巷清真寺”。^①1940年,于铁路以北建立“道北清真寺”。

这样,至民国时期,西安的回民总体上形成三个大区:其一为西区,主要在鼓楼一带,是历史以来所形成的回民伊斯兰教坊聚居区;其二是东城回民社区,主要在名城区东部民乐园、东新街、建国巷等处;其三是北城回民社区,主要位于名城区外铁路以北。东区、北区主要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外来移民所形成的回民聚居区。各个回民聚集区内教坊之间的关系不同,因东大寺在回民宗教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组织管理和领导的地位,因此,西区各教坊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同时,各教坊共生共存,他们共进退,即便是在历史时期的教派纷争中,仍然主张各教坊之间的沟通和团结。

历史以来,西安回民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其宗教社会内部组织秩序同构。民国初期,回民居社区依然服从于保甲组织的管理形式与管理机构,在适应国家政令及地方法规制度管理的同时,形成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教坊为组织形式,教民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结构特征。

参考文献:

- [1]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 西北伊斯兰教研究[C].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5.
- [2] 李键彪. 西安回族与清真寺[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 [3] 勉维霖主编. 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 [4] 马希明. 西安清真大寺[M].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24.
- [5] 〔清〕杨昌浚撰. 平定关陇纪略(卷一)[C]. 中国方略丛书第一辑(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 [6] 回族简史编写组. 回族简史[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 [7] 〔民国〕刘安国编著. 陕西省交通志[M]. 上海:上海书局,民国十七年(1928年).
- [8] 马长寿主编.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A]. 陕西文史资料[C]. 第26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9]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编写组.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收稿日期] 2009-03-03

[作者简介] 任云英(1968~),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历史学博士。
西安 710055

^① 马希明. 西安的几座清真寺[A].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54.

而年节拜庙习俗的存在正是由于草原游牧人信仰喇嘛教。一方面社会的变迁,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变迁影响了文化观念的变迁,另一方面喇嘛教的信仰在这个群体中还存在,在当前正在延续和构建。我们看到,在两种文化之间会产生对话,在互相融合中,农耕文化和牧业文化不会彼此互相混淆,每一文化仍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它们在交融中互相丰富和充实。

四、结语

当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去考察蒙古族过年的时候,从不同地域的个案中,我们看到草原游牧文化的过年习俗受到农耕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内蒙古的农业区域、半农半牧区域和牧业区域所受的农业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这里包括近几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影响。过年习俗的变迁可以折射出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当代文化变迁的诸种因素。在研究中我们看到,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在碰撞和对话中,互相融合,但是它们都具有价值,都具有各自源远流长的传统,它们会保持其原有的文化本体特征,而在交往中不断更新,变成新的文化。

[收稿日期] 2009-01-16

[作者简介] 邢莉(1945 ~) ,女,蒙古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The Changes of Mongolian Celebration of New Year

Xing Li

Abstract Mongolian is used to celebrating New Year. With the transitions of nomadic culture, the customs of celebrating New Year also experiences great changes. Based on field data and taking the celebration of New Year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agro-farming customs and nomadic culture fused mutually in interactions and dialogues. They developed new cultures while keep their own characters.

Key words Mongolian, the celebration of new year, changes

Analysis of Hui's Residential Structure in Xi'an in Modern Times

Ren Yunying

Abstract The spacial structure of Xi'an Hui communities has historically coincided with their religious organizational system. Abiding by the State's laws and local codes, Hui communities surround mosques and are administrated by jiaofang, so that Muslims' sacred life combines with their secular one. Under the jiaofang system, Muslims' behaviors and activities are highly in accordance with jiaofang's spa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Xi'an, Hui community, jiaofang, spacial structure (* P. 160)